

帝国的“蓝色公路”： 《水经注》的空间想象^{*}

田晓菲

摘要: 考察北魏郦道元(?—527)的《水经注》，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重构《水经注》的文本生态，以求阐明此巨著之意义与价值。其一将郦道元的作品置于经注传统的语境脉络中，一方面强调注经者所面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注疏相对于原始文本的创造潜力；其二，让郦道元的著作与同时代的南方山水写作进行对话，强调该著作在空间感知和空间表现方面的独特模式。由此提出，郦道元基于帝国想象，构建了一套由江河组成的基础设施体系，这套江河系统可以被视作以人工运河来佐助自然江河的中古隋唐政体的有力象征。

关键词: 郦道元；水经注；帝国；空间感知；空间表现；山水写作；注疏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1.005

古人是如何想象帝国空间的？无疑是通过疆界和分野，但或许更多的是通过道路与河流。江河将人与物带向各处，将粮食运往都城，将钧旨与新闻传达到帝国远方，强化并延伸了帝国的控制与权力。公元六世纪，诞生了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水经注》，集中关注江河及其限定的空间。作者郦道元(?—527)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386—534)的一位官员。

《水经注》为中国早期中古史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信息宝库。文学学者则将其视为诸多优美的山水描写的资料来源。^①在本文中，笔者提出从两个尚未被郦学学者所普遍采纳的角度来重建《水经注》的文本生态。首先，笔者强调《水经注》的**注疏属性**及其附属地位，一方面强调注疏者所面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注疏相对于原始文本的创造性潜力。其次，笔者在《水经注》与同时期的山水写作之间建立对话，并借此突破现有的对郦道元引用地理书写资源的研究。如笔者在下文所展示的，二者的并置揭示了《水经注》一书所依赖的空间感知与空间表现模式，与此同时也对南方山水书写的研究有所启示。

我们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创作如此卷帙浩繁、即使是在一个地理书写极大丰富的时

【作者简介】田晓菲，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美国波士顿，02138)。

*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 *Asia Major* 杂志 2022 年第 35 卷第 1 期，第 75—120 页。由盘随云译成中文，田晓菲审校，中文稿有所删补修正。

① 为欣赏山水美文而读《水经注》的观点是晚明谭元春(1586—1637)提倡的，谭元春将学者对《水经注》的考证鄙夷地称作“考核丑记”。见郑德坤编：《〈水经注〉研究史料初编》，收于吴天任编：《〈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 年，卷 1，第 46 页)。范文澜《水经注写景文钞》(北京：朴社，1929 年)是最早以《水经注》山水描写为重心的撰著之一。

代也依然引人注目的巨作，其意义与重要性究竟何在。若要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必须把《水经注》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语境中进行考量，解析此书在北魏与南方政权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激烈竞争的时代中的含义。在看似不带个人色彩的注疏里，我们可以听见注疏家以滔滔不绝的第一人称画外音向我们言说，时而激昂，时而亲切，时而采取响亮的缄默，以赋予注疏文字的多少来控制且操纵读者对某条河流的认知——文本的篇幅与该河流本身的大小或知名度毫无关联。最终，酈道元构建了一套基于帝国想象的江河体系，一个把众多偏远地区全都连接在一起的水路网络，而这种连接，如我们将要在后文中看到的，有时仅仅通过文字的关联即可达成。在这一历史节点上，有些河道可能仅仅是流淌墨汁的，大一统帝国也还只存在于遐想中，然而酈道元所建造的江河系统已然可以被视作以其了不起的人工运河来佐助和补充自然江河的中古隋唐政体的有力象征。

一 对《水经注》作为文学的阅读与对《水经注》的“文学性”解读

《水经注》是一部相当奇特的作品。原始文本《水经》一般来说被视为汉代著作，其中包含可能最晚来自公元三世纪的插补，用简要的语言记述了一百三十七条河流。^①酈道元，一名以酷暴和博学著称的北魏官员，为之作注四十卷。^②针对该注的讨论往往提到以下两点：第一，酈注将原本一万字左右的《水经》扩充为三十余万字，包含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与数不胜数地名^③；第二，酈注的主体部分由来自四百余部书籍的引文构成，所引书籍多已亡佚^④。学者以此普遍承认，《水经注》不仅提供了大量有关南北水道以及历史地理的信息，而且以摘录的形式保存了丰富的早期资料。^⑤

作为依附于经的“注”，酈道元的著作植根于其时已建立完善的经注传统。^⑥在早期中古，注疏被看作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文体。与酈道元同时期的刘勰（约465—520）对注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声称“敷赞圣旨，莫若注经”，并表示他之所以选择写作《文心雕龙》，其实不过是因为当时已存在着太多出色的经注：“而马[融]、郑[玄]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⑦

虽然刘勰在此讨论的是儒家经传，但字里行间却充分传达了他对于注疏这一文体的衷心推崇。

① 关于《水经》本身的讨论以及参考文献列表，可参郑德坤编的《〈水经注〉研究史料初编》，第1—3页。英文著作可参 Hans Bielenstein, “Notes on the *Shui ching*”, *BMFEA*, 1993, no.65, pp. 257–283。

② 在魏收（506—572）编纂的《魏书》中，酈道元的传记出现于《酷吏传》。见《魏书》（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卷89，第1925—1926页。传世的《水经注》四十卷并不完整，存在诸多文本问题。本文使用的主要版本为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陈桥驿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③ 此处河流数量基于《唐六典》的统计。《唐六典》成书于739年，代表了八世纪可见的《水经注》版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5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卷，第81页。

④ 郑德坤统计到436部作品，其中现存的只有91部。参见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第4页）。文献来源的数量存在差异，可能取决于是否计算了诗赋等短篇作品。参见陈桥驿《水经注文献录》，收录于他的《水经注研究二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8—520页）。此外，还可参考德国学者徐约和 Jörg Henning Hüsemann, *Das Altertum vergegenwärtigen: Eine Studie zum Shuijing zhu des Li Daoyuan*,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17, pp. 265–356。

⑤ 正如陈桥驿所指出的，在目前并不完整的《水经注》中，只有西藏、东北之极北地区以及现代福建没有包含在内。详见陈桥驿《〈水经注〉记载的广西河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3—5页）。然而，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酈道元对于北方河流的记述更为全面和准确。陈澧（1810—1882年）就曾指出酈道元对几乎所有西南河流的记述都有错误，见郑德坤编的《〈水经注〉研究史料初编》，第158页。

⑥ 参见郑毓瑜在“Text and Commentary in the Medieval Period”一文中对早期中古注疏传统的概述，收录于 *Oxford Handbook for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000 BCE–900 CE*, Oxford U.P., 2017, pp. 123–131。

⑦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09页。

正如普鸣(Michael Puett)在讨论早期传统中注疏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时所说,人们常常会简单地将注疏设想为相对于原始经典而言不仅次要而且低等的文本,但是,恰恰相反,写作注疏归根结底是要“展示后产生的文本相对于其表面上所注文本的优越性”。^①这一洞见完全适用于讨论早期中古儒家经传范围之外的三大注疏,也就是《水经注》,裴松之(372—451)《三国志注》,以及刘孝标(462—521)的《世说新语注》。

这里,《三国志》属史书类,《世说新语》属子书类,此外东汉王逸亦有《楚辞》注疏,属于集部。但是比起这些注疏来,东晋郭璞(276—324)的《山海经》注是与《水经注》更为直接相关的先驱之作,二者在时间上也更加接近。有意思的是,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郭璞也曾为《水经》作注。^②我们应该把这些或在前或在后的非儒家经典注疏视为酈道元《水经注》的语境。在众多典籍中,酈道元选择一部地理著作作为之作注,无疑与其个人对地理议题和现实问题(相对于仪礼或哲学话题)的兴趣有关^③;至于他选择《水经》而非《山海经》,后文会加以分析,这里首先简要地讨论酈道元所选择的注疏风格。

酈道元并不假托训诂学,不会像王逸和郭璞那样对字词进行解释。《水经注》详尽地为原经提供补充,在这一点上,它与裴松之注和刘孝标注更为类似。这三部注疏的作者都采用了同样的写作策略,也就是说,遵守原文既设的基本范围,同时,炫示他们在原文的议题方面对其他资料的无可比拟的掌握。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裴氏与酈氏的相似性:他们都会时而引用与原经相关的资料,有时所引材料之间也会彼此矛盾,并在此类情况发生时,毫不犹豫地加入自己的声音,来评估、判断原文以及引用的材料,借此展示其博学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权威。^④然而——重要的“然而”——这样的写作方式终究受制于他们手头所有的资料。换言之,注疏的目标是展示与原文有关的资料的全面性,但当资料缺失时,注疏者就只有沉默了。^⑤我们同样必须注意:引用某文献并不意味着注疏者就一定赞同它,正如我们在后文中所见,酈道元并不总是认可他引用的文献。相反,作为注疏家,酈道元的目的是将有关原文话题的所有信息呈现给读者。如果他恰好对某一资料的准确与否抱有个人见解,他会以自己的声音做出表示,通常以“按/案”或“余按/案”作为标志性发语词。

① Puett, “Text and Commentary: The Early Traditi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Wiebke Denecke, Wai-Yee Li, and Xiaofei T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16.

②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33,第982页。杨守敬不相信郭璞曾为《水经》作注,但所能提供的唯一证据就是酈道元从未引用过郭璞注。详见《水经注疏》,卷29,第2453—2454页。郭注非常简短(仅三卷),因此,郭璞很可能主要是对词语进行注解,而没有对河流流经之地提供充分的解释;酈道元没有引用它是因为他在其中没有找到他认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③ 本文英文版中“geography”(地理学)一词的使用完全是出于方便,因为中古语境下的“地理”(“地之理”)与现代地理学研究并不相同。

④ 例如酈道元对漾水源头的评注(见《水经注疏》,卷20,第1679—1684页)。与裴松之不同的是,对历史著作的注疏不会给个人的经历见证留下什么空间,而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却不止一处回忆个人经历。

⑤ 如全祖望(1705—1755年)所言,“是书于天下之水,东方则朝鲜,南方则交趾,俱无所遗,独闽中不具”,是因为“自三代以至六朝,闽之文献寥寥”。见郑德坤编:《〈水经注〉研究史料初编》,第180页。D. Jonathan Felt认为,酈道元为了在华夏世界和印度世界之间建造平行对比,“故意在他所谓的全面性地理中排除了(蒙古草原)”,“即使他手头确有关于这些地域的资料”(见Felt, *Structures of the Earth: Metageographie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Asia Center, 2021, p. 242)。然而, Felt为蒙古草原上的河流所能提供的唯一资料是《史记》和《汉书》中的《匈奴列传》(见氏著 *Structures*, 第328页,第95注),其中没有关于那些被一带而过的河流的任何细节,不足以构成可供注疏家使用的文本资源。这与存在于酈道元时代的关于印度的丰富文献资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多学者将《水经注》中的引文视为酈道元个人观点的表达，或认为他的一系列旁征侧引构成了某种具有连贯性的综合意义；有时，他们对《水经注》中的山水描写赞不绝口，却忽视了这些山水描写实际上大都引自别的文献，并非酈氏所作。笔者以为，这些做法都未免过分夸大和扭曲了《水经注》的意义。再考虑到《水经注》充斥着文本问题，而且古人引文并不使用引号，这些因素都更是加深了上述的问题。即使酈道元有时会明确告诉我们他在引述某文献或某作者，我们也还是不免要疑惑：该引文到底在何处终止？注疏家自己的言说又从何处开始？因此，在阅读和使用《水经注》时，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它的注疏性质，以免落入上述的常见陷阱：这重要的一点虽然似乎显而易见，但又常常受到忽略。我们究竟是在阅读“酈道元”，还是某个更早的作者？对于前人的观点，酈道元的态度究竟如何？当一个注疏者在综合他所收集到的材料时，他到底会有多么小心在意抑或多么漫不经心？回答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既在微观的也在宏观的层面，仔细地、抽丝剥茧地阅读文本。

《水经注》中，很多最为读者所熟知的优美的山水描写并非出自酈道元之手。^①生活在南北分裂时期的酈道元一生中从未踏上过南方的土地，因此，那些对南方山水的生动描绘无疑是由南朝的作家创作的。对于文学学者和文学史家来说，与其在《水经注》的背景下讨论那些引文，不如将其还原于南朝山水写作与行旅文学的语境中加以讨论。

事实上，即使在描述北方的河流时，尽管许多河流他都确实亲自游览过，酈道元最大的热情仍然是对文献学的热情。他并不是一个钟爱户外探险的大自然勘察者。在《水经注》序言中，他这样描述自己：“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②换言之，从童年到成年，他都不是一个为了山水本身而去游历山水的人。他并且相信，博学足以弥补实践经验的不足：

寻图访迹者，极聆州域之说；而涉土游方者，寡能达其津照，纵仿佛前闻，不能不犹深屏营也。^③

在他对《水经》的注疏工作中，酈道元最大的遗憾便是自己学识疏浅：

识绝深经，道沦要博，进无访一知二之机，退无观隅三反之慧。独学无闻，古人伤其孤陋；捐丧辞书，达士嗟其面墙。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故亦难矣。然毫管窥天，历箭时昭，饮河酌海，从性斯毕。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文。^④

在这段文字的最后一部分，酈道元风趣地使用了一系列有关船和水的隐喻——“闭舟”“饮河”“酌海”——来描述自身的局限。但是，比起实践知识和地理经验的不足，他更多地为自己缺乏书本知识与学识渊博的同道而叹惋。^⑤

归根结底，《水经注》中的山水描写，尤其是那些我们可以确定出自酈道元之手的山水描写，只占整部巨著的一小部分。它们既不是这部著作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作者的主要兴趣。虽然在前现代时期《水经注》文本的确有流通也被人阅读，但是如果说它对山水文学或行旅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 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以“自三峡七百里中”开头的那段著名记载。那一段文字来自五世纪南朝作者盛弘之的《荆州记》，但酈并未标明其出处。尽管学者们对此了然于胸，他们仍将这段文字和《水经注》、酈道元放在一起讨论，而不是将其置于南朝文学的语境中，虽然后者是更为妥当的。

② 《水经注疏》，第1页。《水经注原序》，收录于《水经注校释》，第5页。

③ 在《水经注校释》中，“迹”作“蹟”。

④ 酈道元对“述”字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他序中对《论语》的频繁引用和呼应一样，此处的潜指很明显是“述而不作”的孔子。无论原始文本《水经》如何定位自己，一旦有郭璞和酈道元为之做注，它立刻就成了一座“经典作品”。

⑤ 这并不意味着酈道元不重视经验性知识，实际上他在注疏中曾多次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证据。但是他对河流的兴趣主要是学究式的，他只亲自考察了《水经注》所有河流的一小部分，而且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性。

那么这种说法就太过夸张了。^①在手抄本文化时代,读者不易获取或接触到这样的鸿篇巨帙。八世纪学者杜佑(735—812)曾抱怨想要得到一部带有郭璞和酈道元注疏的《水经》是何等艰难:“访求久之,方得。”^②任何关于《水经注》如何影响了某中古作家的说法,都应考虑该作家可以接触到的书目要比后世丰富得多(因此可能接触到的是《水经注》所引书籍而非《水经注》本身);同时,也要考虑类书在一个人的文学教育中发挥了怎样举足轻重的作用。^③以五世纪作者盛弘之的《荆州记》为例:从类书与注疏引用此书的频率来看,这是一篇在中古时期极其出名且流行的文本;因此,李白广受赞誉的绝句《早发白帝城》,很可能是直接从盛氏作品或通过类书汲取了灵感,不必非得要依赖酈道元的洋洋巨著作为中介。^④

本文不准备在《水经注》中搜集零星的山水描写并将其作为纯文学的出色样本进行阅读^⑤,相反,笔者建议对《水经注》作出一种“文学性”的解读,也就是说,关注酈氏的修辞策略和语言策略,并将其放置于它的周遭文本环境中进行考量,以阐明其结构、写作动机,以及同时代的文学语境。这种解读必然要始于对酈道元的写作及其独特修辞术的细致分析。

二 “河流旅人”(Riverine Traveler)之所见:“征赋”模式

《水经注》中大部分条目都以河水流动——“迳”某某地——作为开篇。^⑥每个条目基本上采用的格式是大量引述河流所经地点的有关资料,其中穿插酈道元自己的评注。本节将展示,酈道元在条目中主要承袭了“征赋”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叙述者行经各地,思考一个地方带有标志性的人与事,正是这些人事把这个地方和具有普遍性的山水风景区分开来。在征赋中,作者的目光从不聚焦于大自然的美景或者说纯粹的河水、地势、植被;相反,征赋关注的重点乃是人类文明在自然界留下的痕迹。唯一不同的是,征赋的主体始终是人,也即作者本人,第一人称叙事中的“吾/目”(I/eye);而在《水

① 苏轼在《寄周安孺茶》中写道:“《水经》亦屡读。”这句诗常被引用,尽管苏轼很可能是为了获取其中的信息而阅读《水经注》,而并非出于对其文学质量的赞赏,正如他在著名的《石钟山记》中对酈注的评价所表明的那样。事实上,在那篇游记中,苏轼批评酈道元未能像他自己那样通过仔细的个人实地考察来发现真相。详见《东坡续集》卷1,《苏东坡全集》(台北:世界书局,1969年,卷2,第26页)。另一常被引用来支持这一说法的是明末散文家张岱“古代记山水手太上酈道元”的说法,然而时至十七世纪,酈道元所征引的早期中古文献早就散失已久了(见张岱:《跋寓山注》,《张岱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06页)。

② 《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卷174,第4561页。

③ 关于类书在中世纪精英文化教育和写作中的重要性,参考 Xiaofei Tian, “Encyclopedias and Epitome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pp. 132-146; Christopher M. B. Nugent, “Medieval Encyclopedias”, Jack W. Chen et al., eds., *Literary Information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P., 2021, pp. 295-305。

④ 盛弘之描写三峡的文字可见初唐类书《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7,第122页),以及北宋初期类书《太平御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卷53,第388页)。此外,《荆州记》在八世纪初的类书《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中被引用四十余次。有鉴于此,我们应重新评估 Richard E. Strassberg 的观点,即“得以广泛流传的是酈氏引人入胜的版本”,且认为酈注乃是“基于他的个人观察”(参见 Strassberg,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 California P., 1994, p. 84)。

⑤ 在此有必要强调:笔者并不反对将酈注中的部分篇章段落视为出色的山水描写,但首先,只要情况允许,我们必须尽量区分酈道元自己的写作和他书的引文;其次,我们应将引用的文本放在其自身的文本生态系统中考量。因此,在一个正当的文学史叙述中,盛弘之的《荆州记》应该与南朝的地理写作、山水诗和志怪放在一起进行研究。

⑥ 酈道元将《水经》原文分解为句子或短语,直接在其下方(在现代版本的排版中)附上注释,笔者所谓“条目”是指酈氏的分段注疏。戴震以为《水经》用“过”来表示河水的流动,而酈道元则用“迳”字,这一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详见吴天任编《《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卷1,第86页)。顺便提到,有一种小众意见认为酈道元可能也是《水经》本身的作者。但是,在注疏的许多地方,酈道元或提出对《水经》经文的怀疑,或直接指出其中的错误。我们没有证据,也难以找到任何可信的动机,来支持酈道元精心伪造了《水经》这一观点。

经注》里，河流才是蜿蜒轨迹的主体，它不断运动，从不停息。《水经注》中的河流就仿佛拥有意识和自我意志，扮演着一个孤独旅人的角色，而酈道元则是它的副手和随从，一个辅佐其主人堂吉诃德的桑丘·潘沙。在注疏中，通常极少有直接描述河流本身的内容，这大概是因为所有河水看上去都并无二致；相反，酈道元专注于河流流经的陆地。他从河流旅人(riverine traveler)的视角感知万物，这个视角向外延伸，观察两岸上的一切，除了河流自己。

这一特殊的写作方式在《水经注》第十六卷中表现得最为清晰。此卷包括五条河流：谷水、甘水、漆水、浚水、沮水。我们在此讨论谷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河流旅人带着酈道元踏上一段旅程，引领他紧紧跟随前朝的一位著名旅人的足迹，一位为这趟旅程作下征赋的作家。此人乃是西晋文学家潘岳(247—300)，而我们在此关注的便是他的《西征赋》。酈道元对谷水旅途的记述在地理和文字上都几乎是在一步步地追踪潘岳的旅程，唯一不同的是，谷水游历的方向是相反的：人类旅行者受事务的驱使前往四面八方，河流旅行者却总是向东奔流，它们的目的地通常是一条接纳它们的大河，最终汇入大海。^①

谷水是一条小河，小到甚至“没有出现在现代地图上”。^②它发源于浞池县(今河南)并在洛阳汇入洛水，全长不到一百英里。《水经》总共只用了三十四字来介绍谷水：

谷水出弘农颍池县南墻冢林谷阳谷。东北过谷城县北。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③

然而，仅仅针对这段话的首句，酈道元就附加了近两千字的评注。在简要解说谷水的源头后，他开始沿着河水流动的方向记述。为方便讨论，笔者将这些段落作了编号：

(1) 谷水又东，迳秦赵二城南。司马彪续汉书曰：“赤眉从颍池自利阳南欲赴宜阳”者也。世谓之俱利城。耆彦曰：“昔秦赵之会，各据一城，秦王使赵王鼓瑟，蔺相如令秦王击缶处也。”冯异又破赤眉于是川矣。故光武玺书曰：“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颍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矣。”^④

这是《水经注》中的一个典型段落：作者通过河水所流经的人类建筑(俱利城)来描述河流的流动，以历史记载与当地耆彦的话语为证。河水被历史事件(冯异击败赤眉)标记，该事件再次由前人文字(光武帝玺书)所证实。

接着，在一段两次以“又东”作为点断的简短文字之后，酈道元写道：

(2) 谷水又东迳新安县故城，南北夹流，而西接崤崤。昔项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万于此，国灭身亡，宜矣。^⑤

(3) 谷水又东迳千秋亭南。其亭累石为垣，世谓之千秋城也。潘岳西征赋曰：“亭有千秋之号，子无七旬之期。”谓是亭也。^⑥

在段落(3)中，酈道元直接引用潘岳的赋作，但任何熟悉潘赋的中古读者在读至此段之前，恐怕都已经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⑦公元292年，潘岳从洛阳出发前往长安任职，他在赋中详细叙述

① 《水经注》里记载的唯一一个例外是朝鲜半岛的沮水，它向西流而非东流。酈道元对此极为感兴趣，甚至曾向一位朝鲜使者询问了相关情况。详见《水经注疏》，卷14，第1280页；《水经注校释》，卷14，第261页。

② 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5页。

③ 《水经注疏》，卷16，第1363—1374页；《水经注校释》，卷16，第285—287页。

④ 《水经注疏》，卷16，第1363—1365页；《水经注校释》，卷16，第285页。

⑤ 《水经注疏》，卷16，第1366页；《水经注校释》，卷16，第285页。

⑥ 《水经注疏》，卷16，第1366页；《水经注校释》，卷16，第286页。

⑦ 潘赋在早期文学传统中具有经典地位，收入萧统《文选》，当为中古读者所熟知。

了旅途经历。以下文字分别来自他对千秋亭、新安和浞池的描写,段落标号反映了潘岳所经地点的顺序,与谷水流经地点的顺序正好完全相反:

(3) 天赤子于新安,坎路侧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无七旬之期。虽勉励于延、吴,实潜恸乎余慈。

(2) 眇山川以怀古,怅揽辔于中涂。虐项氏之肆暴,坑降卒之无辜。激秦人以归德,成刘后之来苏。事回浞而好还,卒宗灭而身屠。

(1) 经浞池而长想,停余车而不进。秦虎狼之强国,赵侵略之余烬。超入险而高会,杖命世之英简。耻东瑟之偏鼓,提西岳而接刃。辱十城之虚寿,奄咸阳以取僇……当光武之蒙尘,致王诛于赤眉。异奉辞以伐罪,初垂翅于回谿。不尤肯以掩德,终奋翼而高挥。

向洛阳东流的谷水,“倒序”经过了潘岳西征时所见的地点。潘岳在“眇山川”时并没有真的看到它们;相反,他用思维之眼看到或是“想”到了过去^①:无论是被项羽活埋的降军,是光武帝和冯异,还是智斗秦王的蔺相如。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也正是酈道元的河流旅者一路所见的景象。酈道元既然引用了潘赋,那么注疏与赋作的交叠多半不是巧合,而是酈道元对潘赋的刻意回应。他透过潘岳的眼睛观察,甚至得出了和潘岳完全相同的道德教训。洛阳和浞池之间虽然一定有许多优美的自然景观,但两位作者都只是在关注人类的事件和建筑。石头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在酈道元眼中只作为驿亭的墙垣出现。两位作者都呈现了一系列交叉、重叠、抹掉又覆写的历史时刻,却对物理的自然山水视而不见。

三 审美与历史的碰撞:与同期南方山水书写的比较

潘赋中的“眇山川以怀古”这一句,概括了征赋写作和《水经注》中旅人的游动视野(peripatetic vision):自然山水只有作为人类事件的发生场所才具有意义。^②这种观察模式将大自然视为人类事件与活动所余痕迹的存储库,与南朝山水诗的写作模式恰好相反。

公元四世纪,“山水”作为一个指代自然风景的固定复合词开始在南方被频繁使用。“山水”的话语形成反映了一场更大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自觉地意识到对山水的审美欣赏已然萌芽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展,而这种审美欣赏的能力也成了衡量一个精英成员是否拥有精致的文化感受力与高超的精神资质的标准。到五世纪末,南朝已经建立起相当成熟的山水美文传统。诸多此类写作聚焦于山水的精神性之美,提供了一个逃脱社会、逃脱历史的方式。

此类自然书写在谢灵运(385—433)笔下臻于完善。在一首典型的谢诗里,山水毫无任何时空坐

① 在当时的文化话语中,“想”(观想/心像构建)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详见笔者 *Visionary Journeys: Travel Writings from Early Medieval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Asia Center, 2011, pp. 21–22), 中文版《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第25—26页)。

②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酈道元对青年时代亲身到访之处的回忆散见于他的注疏,他却并不像谢灵运在其《撰征赋》中所表现的那样对过去充满怀旧之情,也并不表现得好像是一个汉帝国终结后的“迟来者”(late-comer)。在这一点上,笔者不认同戴梅可(Michael Nylan)关于酈道元在“汉后的分裂时期”(post-Han period of disunion)构建了一个“记忆帝国”(empire of memory)的观点。见 Nylan, “Wandering in the Ruins: The *Shuijing zhu* Reconsidered”, Alan K. Chan and Yuet Keung Lo (eds.), *Interpretation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Albany: SUNY P., 2010, p. 63。值得注意的是,戴文主要基于施蛰存《水经注碑录》,误把它视为《水经注》的“最好版本”(best edition)(第92页,注1),因此,其论点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施氏《碑录》只是对《水经注》中碑刻的编录,当然不能代表《水经注》的全貌,更遑论是其“最好版本”。

标，诗人直接面对无名自然的惊世之美。以其《石室山》一诗为例^①：

清旦索幽异，放舟越垧郊。莓莓兰渚急，藐藐苔岭高。
石室冠林隈，飞泉发山椒。虚泛径千载，峥嵘非一朝。
乡村绝闻见，樵苏限风霄。微我无远览^②，总筭羨升乔。
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合欢不容言，摘芳弄寒条。

本诗一开篇即呈现“清旦”与“幽异”的黑白对比，充满动感。“放舟”索奇的诗人与坐在书斋中“默室求深、闭舟问远”的注疏家截然相反。诗人以“急”“飞”来描写疾速奔流的河水，然而，它所“迳”——这正是酈道元《水经注》的常用字——并非人类文明的遗迹，而是时间：缺乏任何历史事件作为标记的“千载”。

在诗中，人类场所与人物都以集体无名的形式出现（如“乡村”），以否定性的形式出现（樵苏无所闻见，受到物质条件的局限）。在“微我”一句中，作者自信地声称“远览”是他的专属活动，而之所以“远览”，并非出于打柴或收集草药等实用主义的目的，而是被冒险与探索精神所驱使。和“樵苏”一样，诗人也在山中采摘，但他所采的仅仅是花朵，甚至就像“摘芳”的字面含义所显示的那样，只是一种香味而已；“芳”强调了一种身体的感知，也象征着人与大自然之间不必使用语言的神秘交流。樵夫砍下“寒条”作为柴草，然而我们的诗人却在“弄”寒条，一个亲密、悠闲、百无聊赖的手势，满足了审美的而非实用的需要。诗人与樵夫的差异是作者刻意嵌入诗中的，这既是对大自然两种不同态度的分歧，也是两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差距：诗人作为显赫的陈郡谢氏家族的成员，在各个方面都与芸芸众生迥然不同，这包括他探寻和观赏的风景，以及他与山水建立的关系。

全诗最末四句让人联想到谢灵运的同时代诗人陶渊明（365—427）著名的诗作《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以及用了庄子“得意忘言”之典的玄妙尾联：“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③我们可以说谢灵运“改写”了陶诗：陶采菊而谢摘芳，同时，对语言文字的委弃（“不容言”）也出现在《石室山》的尾联，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自我指称的手势，引向一幅芳华与寒条的画面，而诗人采花、弄枝的主体嵌入这一场景，成了画面的一部分。

在“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这一联诗里，我们还能听到另一段文字的回声，酈道元的三峡章节也引用了这段文字，那便是陶、谢的同时代人袁山松（？—401）在《宜都记》中所写的一段话：

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嶂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④

袁山松想象自己是三峡山水“千古”以来的第一“知己”。同样，谢灵运也将自己描述成一个近距离观察并且欣赏石室山之美的人。“心赏”指涉的对象含糊不清，因为诗人与石室山互为密友，是彼此的知音（后世李白的“相看两不厌”之谓）。诗人和山水之间的交流不用中介，不需要任何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介入。

①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64页。

② “微我”一作“微戎”，不取。

③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98页。

④ 《水经注疏》，卷34，第2845页；《水经注校释》，卷34，第596页。袁山松一作袁崧。

四 引文:另一个角度

《水经注》中保留了袁山松《宜都记》的许多片段^①,包括上引的那段话。作为注疏,《水经注》主要由引文组成,但是,和同样大量使用早期文本以求在山水中发现哲理的谢灵运山水诗不同,酈道元的引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山水纳入一个社会与历史知识的体系,从而命名山水,定义山水,以及在帝国地理版图上标记山水。《水经注》的引文从另外一个角度使我们得以一窥酈道元的空间想象以及他所偏爱的写作模式。

郑德坤对《水经注》引文按照传统的文献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史部所引作品数量最大,共208种,经部(84种)、子部(62种)次之。^②在集部下,郑开列出42部别集,虽然这不能反映酈注中引用的单篇诗赋。经粗略考察,我们并不意外地发现,酈道元对赋作引用甚多,总计50篇左右。^③至于诗作,以《诗经》篇目出现得最为频繁,引文前一般有“即诗所谓”或“诗云”这样的标志。^④《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具有权威性,但它并不被视作纯文学作品。除《诗经》篇目外,据笔者粗略统计,《水经注》中仅有16首来自距酈道元生活时代较近而且作者身份明确的单篇诗作。^⑤其中四分之一属于阮籍(210—263)《咏怀诗》,并且除了三首诗之外,全都是作于五世纪之前的。^⑥换句话说,酈道元引用赋远远多于诗,而在诗歌引文中,现当代诗皆非他的首选。

其实酈道元显然能够很容易地接触到当代的南方美文作品^⑦,因此我们只能下结论说他对南方现当代的行旅诗、山水诗缺乏兴趣,而不是因为他接触不到它们。酈注中引用的最接近酈道元本人生活年代的南方诗人是吴均,有趣的是,吴均的诗风以“古气”著称,而且酈道元所引吴诗与山水描写无关。^⑧虽然酈道元确曾提到谢灵运的《山居赋》^⑨,但现存《水经注》不包含一句谢诗,即使谢的许多诗篇都能轻易地融入酈道元对南方河流的注疏中。有一次,酈氏提到谢灵运与其族弟谢惠连一同在大树下联句并题写于现场,但却未引用其中任何一句。^⑩酈道元在引用诗文典籍时是经过刻意筛选的,他的选择显示了他对历史信息和地理信息的强烈偏好。酈道元的选择与后世《水经注》注家的做法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比如说杨守敬(1839—1915)在对酈注的评注中就大量引用了南朝、唐、宋诗歌,

① 鲍远航在《水经注》卷34和卷37中统计到十二处对《宜都记》的引用。见鲍远航《水经注与魏晋南北朝地理文学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05—211页)。

② 《水经注引书考》,第4页。

③ 童珉统计到47首赋。见其《水经注引赋考论》,《赤峰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3,第33—34页。

④ 据学者统计,《水经注》对《诗经》的引用超过五十处。见张鹏飞《〈水经注〉引〈诗〉考》,《文史博览》2006年第18期,第25—26页。

⑤ 也即自东汉以降。按附录列表不包括地方谣曲。如刘表(142—208)据说曾歌《野鹰来曲》(《水经注疏》,卷28,第2378页),或咏唱山简(253—312)的襄阳歌谣(《水经注疏》,卷28,第2381页)。前者《水经注》只提到标题,后者则有四句歌词被引用。

⑥ 这三首五世纪的诗作者分别是宋孝武帝刘骏(453—464年在位;酈注以其小字“道民”称之)、谢庄(421—466)和吴均(469—520)。见《水经注疏》,卷28,第2374页;卷39,第3247页;卷40,第3302页。

⑦ 譬如说,除了上注提到的作家外,酈道元还引用了南齐萧子隆(474—494)的《山居序》。萧有文集传世。见《水经注疏》,卷24,第2013页。

⑧ 见《梁书·吴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49,第698页)。酈道元引用谢惠连(407—433)著名的《雪赋》也是同样道理:此赋描写的是想象中西汉时期梁孝王的兔园集会,酈道元引用其中一句来描述历史上真实的兔园。换句话说,酈道元感兴趣的是古代事迹,不是大自然山水本身。见《水经注疏》,卷24,第2013页;《水经注校释》,卷24,第427页。

⑨ 《水经注》称《山居记》,熊会贞以为即《山居赋》。见《水经注疏》,卷40,第3330页;《水经注校释》,卷40,第693页。

⑩ 《水经注疏》,卷40,第3313页;《水经注校释》,卷40,第693页。

他的引文恰好凸显了郦注中此类诗歌的缺席。

公元四、五世纪的南方精英对自然之美的兴趣逐渐深化。山水描写的兴起“是一个内向不次于外向的运动”^①。这些精英们信奉“以玄对山水”，一种源自内在、照亮外在的精神开悟。^②如果说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和征赋一样都是以徐约和所谓的“览古”或“存古”精神(das *Altertum vergegenwärtigen*)写就的，或者用谢灵运的话来说，它们的作者“满目皆古事”^③，那么，在当代南方的新型山水诗中，人们终于找到了一种逃脱历史与帝国的途径。在与大自然之美的直面接触以及借此实现的精神超越中，不容许历史和人事的侵入。

如前所述，学者已就谢灵运的山水体验如何受到前代文本如《易经》或《楚辞》的中介展开过详尽的讨论。但是，谢对早期文本的运用，和在山水中看到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征赋模式截然不同。谢灵运的《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一诗可以被解读为针对历史之暴权的蓄意对抗。在诗的开篇，作者对一座缺少古代遗迹之山的空旷发出惊叹，而在诗的结尾，诗人对“当下”的价值做出了积极的，甚至可以说是喜悦与振奋的肯定：

南州实炎德，桂树凌寒山。铜陵映碧涧，石磴泻红泉。
既枉隐沦客，亦栖肥遁贤。险径无测度，天路非术阡。
遂登群峰首，邈若升云烟。羽人绝仿佛，丹丘徒空筌。
图牒复泯灭，碑版谁闻传？莫辨百世后，安知千载前。
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

笔者认同宇文所安对这首诗的解读，即身为秘书监的谢灵运在发现文本辜负他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目标”、转而直面“被清空”的山水^④，但在笔者看来，当诗人无法在山水中找到文本或神仙时，他感到的是解脱而不是失望，因为他可以就此沉浸于当前现下、此时此景。他沉溺于月光和流水——两者都是银色的，流动的，常用来作为时间流逝的隐喻。就和《石室山》的末句一样，诗人用的动词又是“弄”：嬉弄、玩弄，给人以悠闲无目的之感。诗人对当前现下、此时此地的体验是暂时性的，“恒充俄顷用”，不会传到百世、千载之后，而他对此感到完全的满足。

《水经注》里没有空间给这类诗篇。但是，郦道元在注中引用赞赏自然之美的南方山水散文如袁山松《宜都记》中的段落，又该作何解释？一方面，那些引文只是这一鸿篇巨制的极小的一部分，从数量上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从郦道元的眼光来看，那些段落所赞美的地点往往没有“历史”。事实上，令袁山松惊叹不已的扬子江段，就郦道元来说，恐怕正是袁山松本人和他的经历才构成了标志该地特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如说，在提到长江南岸一座优美的山岭时，郦道元写道，“袁山松为郡，尝登之瞩目焉，故其记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岭，岭容十许人”云云。^⑤袁山松抒情性的描写就这样被引用和纳入了一个地方史的框架，而袁山松本人则是作为代表皇帝治理地方的行政长官（“袁山松为郡”）被载入《水经注》的。

① 关于“内省之山水”，见笔者《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讨论：Xiaofei Tian, Chapter 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I: To 137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13-214; 也见 Tian, *Visionary Journeys*, pp. 34-35。

② 引文来自孙绰(314—371)《太尉庾亮碑》，见严可均编：《全晋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卷62，第1814页。

③ 见谢灵运《入东道路》诗，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175页。

④ Stephen Owen, “Librarian in Exile”, *Early Medieval China* 10-11.1, 2004, p. 210.

⑤ 《水经注疏》，卷34，第2847页；《水经注校释》，卷34，第596页。

五 帝国的蓝色公路

如果说同时期的南朝山水写作提供了逃脱历史与帝国的可能,那么酈道元的著作则深深沉浸于历史和帝国的关怀。在酈道元生活的时代,已有两部地理学著作以“经”为名而且已经得到注疏,也即《水经》和《山海经》。酈道元选择《水经》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山海经》的神奇性质不适合酈道元的历史情怀,但可能更加重要的是,山和海都是固定不动的,而河流却在不断移动,将相隔甚远的地方连接在一起。河流是帝国的“蓝色公路”:人、物、信息都借助河流得以流通。

一个语言建构的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它也是一个事件:是作者的作为(act),是历史中发生的情节,也必须被如此阅读和阐释。酈道元成长于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的统治时期。作为一个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鲜卑与汉族的混血统治者,孝文帝于493年将都城从旧日的鲜卑势力中心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洛阳,怀着征服南方、统一天下的意图,发起了一系列政治改革。^①这一年,孝文帝曾发布一道诏令,驳斥一个反对南征的朝臣,其中明确说道:“奋臂一呼,或成汉业。”^②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北魏帝国想象中的汉朝模式。不过,对我们的《水经注》讨论尤其重要的,还是太和十四年(490)的一场朝堂辩论。

该年秋季,孝文帝要求朝廷官员基于五行相生的王朝更迭理论为北魏确定合适的元素。^③部分官员认为,象征火德的汉朝之后乃曹魏(土)、晋(金)、赵(水)、燕(木)、秦(火),北魏继秦,应为土德。以李彪(444—501)、崔光(451—523)为首的另一部分官员则主张北魏应当效仿汉朝;汉越过秦朝而直接继承周朝,北魏也应越过赵、燕、秦这些“促褊”王国,直接继承晋朝,因此代表水德。经过激烈的廷辩,后一种观点得到了采纳。491年初,孝文帝宣诏说:“朝贤所议,岂朕能有违夺?便可依为水德。”^④

主张北魏水德说的李彪是一位博学的学者,也是酈道元的举荐和资助人。^⑤崔光是著名的青州崔氏家族的成员,与酈道元的父亲酈范(428—489)可能有所关联。酈范曾在469年北魏军队从刘宋王朝夺取青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不久后被任命为青州刺史,当时还年幼的酈道元也随父前往。^⑥酈道元的仕宦生涯始于孝文帝时期,在《水经注》中多次提及他亲身随同皇帝北巡的经历^⑦,其中一次发生在太和十八年(494),这也是酈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对个人生活记录下来的最早日期。^⑧作为一个“清勤”的官吏,酈道元以“威猛”“严酷”知名,以致被收录在《魏书·酷吏传》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515年或稍后,他治下的蛮族百姓不堪忍受他的“刻峻”而向朝廷投诉,酈道元因

① 《魏书》,7B,第172—173页。

② 《魏书》,卷47,第1048页。

③ 《魏书》,卷181,第2744—2747页。

④ 《魏书》,卷181,第2747页。

⑤ 《魏书》,卷89,第1925页。酈道元甚至因李彪遇到麻烦而遭受了他的第一次政治挫折。详见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27,第995页)。又见鲍远航对二人密切关系的讨论,鲍远航:《〈水经注〉与魏晋南北朝地理文学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23—127页。

⑥ 《水经注疏》,卷26,第2206—2207页。

⑦ 《水经注疏》,卷3,第237页;卷20,第1683页;《水经注校释》,卷3,第44页。

⑧ 《水经注疏》,卷3,第235页;《水经注校释》,卷3,第44页。

此被免职。^①

检视酈道元生平种种，我们意识到：尽管他对历史遗迹与历史记录充满兴趣，酈道元是一个深深植根于北魏王朝现实生态的作者，就连他注疏《水经》的选择也难免与北魏的“水德”发出共鸣。^②《水经注》既是一部充满了学究癖好的作品，也是一部带有“天下”意识形态观的著作。如果考虑到南朝政权一直都在努力建构帝国和王权话语，这一点毫不出人意料。公元五世纪，南朝宋、齐两代统治者在物质与话语双层面建造首都建康，使建康从一个政府的行政基地转化为一个辉煌的都城，南朝也从东晋时期的难民政权转化为一个繁荣帝国。^③酈道元有方便的条件对南朝产生较为深度的了解。五世纪八十年代，他被任命为尚书主客郎，负责接待使臣。^④这正值北魏南齐相互频繁遣使之际，酈道元的恩主李彪就曾不止一次出使南齐。^⑤与南朝使臣的接触无疑可以帮助酈道元熟悉南方宫廷修辞，并有机会读到南方文本资料，包括最新的书籍，比如说沈约(441—513)于488年献呈皇帝的《宋书》。^⑥

关于《水经注》的意识形态倾向，我们可以作出两点观察。首先，酈对南北河流的注疏长度分配失衡和他在其文本等级体系中赋予各条河流的不同重要性息息相关。其次，虽然酈道元对早期地理记录向来不惮纠误，但他对北土地理的南方记载批评得更加激烈，也更带有个人感情色彩。

关于第一点，我们需要回到《水经注》的注疏本质。作为注疏，酈作的框架受限于《水经》原文，这是必须一再强调的重点。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水经》中北方和南方的河流分布相对均匀：北方河流七十余条，南方河流约六十五条。^⑦然而现存《水经注》四十卷中，有二十六卷被北方河流占据。如果我们检视一下酈道元对“四渎”(江、河、淮、济)的注疏，我们会看到黄河占五卷(卷一至卷五)，而南方的巨川长江仅占三卷(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五)；北方的济水占两卷(卷七至卷八)，发源河南但是河道大半穿过安徽、江苏的淮水只占一卷。据陈桥驿统计，酈氏对黄河所作的注疏长达五万余字，占整部《水经注》的七分之一；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说，酈氏对黄河的注疏比《水经》原文对黄河的描述长九十倍之多，而酈注总体平均只比《水经》原文长二十倍左右。^⑧《水经》原文对淮河的记述共194字，对渭水的记述共130字，从字数上看二者篇幅可谓相当。然而在酈注中，渭水注疏长达三卷(卷十七至卷十九)，在现代版本中一共占了三十二页，几乎是淮河注疏的三倍。

这里，“谷水”注再次启人深思。如前所述，谷水是一条小河，它在《水经》中的简短记述与河流本

① 《魏书》，卷89，第1925—1926页。相比之下，美国学者Felt对酈道元持有过于浪漫化的观点，认为《水经注》“去中心化”了华夏中心区域，将外国人、夷蛮民族、边疆人民纳入合法空间，使其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参与者”，并认为“《水经注》中大部分对蛮族的描写都是在描述中原诸国对其所发动的征伐”(Felt, *Structures*, p.176, 183)。具有讽刺性的是，酈道元本人正是“征伐”者之一，参与了对那些“有意义的历史参与者”的迫害，使他们不得不向“华夏中心区域”寻求庇护和救援。

② 这种对本朝的忠诚和所谓爱国主义精神不同。爱国主义属于二十世纪民族国家话语，不宜和前现代人对王朝政权的忠诚相提并论。

③ 关于南朝帝国的建构以及对都城的建设，见 Xiaofei Tian, “Representing Kingship and Imagining Empire in Southern Dynasties Court Poetry”, *T'oung Pao* 102.1-3, 2016, pp. 1-56(中文版《南朝宫廷诗歌里的王权再现与帝国想象》，雷之波、何维刚译，《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20年第30期第1号，第141—182页)。

④ 《魏书》，卷89，第1925页。

⑤ 《魏书》，7A，第152—153、155—156、168页。

⑥ 这可以从酈道元对《宋书》的纠误看出。见《水经注疏》，卷25，第2140页；《水经注校释》，卷25，第453页。

⑦ 需要说明几点：一、这一计数基于《水经注》四十卷中每卷开列的河流；二、对于那些穿越南北领土疆域(据五世纪政治版图)的河流，笔者将发源于北方境内并主要流经北方领土的河流视为“北方河流”，譬如说卷二十中的丹水，起源于商洛(今陕西境内)，向东南流经河南，最终在均州(今湖北境内)汇入汉水；三、《水经》据说有部分遗失，因此不能排除河流分布受到这一情况影响的可能。

⑧ 《水经注校释》，卷5，第94页。

身之短小十分匹配。然而酈道元却对这一节附上了近八千字的评注,陈桥驿称之为“全书第一长注”^①。这种令人瞠目的铺张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谷水流经北魏王朝的首都洛阳。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漯水:它并非一条大河,《水经》只给了它47个字的描写;但酈道元却专门为这条河流开辟了一整卷(卷十三),附上了将近六千字的评注,因为漯水流经平城,而平城则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北魏旧都。

换言之,酈注将更多文本空间留给北方河流,尤为偏向作为政治中心的北方城市。与此相反,现存《水经注》没有一处提到六朝都城建康。长江既然流经建康,这似乎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缺失。此外,酈氏对长江的注疏突然终止于湖北、江西交界处的青林湖,未涉及长江在安徽和江苏的流程。^②由于类书、注疏和其他文献保存了关于长江下游的《水经注》佚文,清朝学者全祖望(1705—1755)推测现存《水经注》佚失了一卷关于长江的内容(这一卷想必包括了有关建康的文字)。^③这当然是可能的,但远非确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完全不清楚这据说是遗失了的一卷到底有多长或者多详细。^④

关于汉水(《水经注》称沔水)的经文和注疏进一步复杂化了全祖望的推测。汉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水经》卷二十八称其“南至江夏沙羡县,南入于江”^⑤,之后又在卷二十九伊始称其“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⑥。由于汉水和长江被认为在武汉交汇,下面的注疏按理说应该包括长江从武汉之后流经安徽和江苏直抵东海的记录。乍看上去《水经注》似乎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流经武汉之后的长江中下游却只占《水经注》现代版本的六个页面,即使它流经了无数名胜之地。虽然全祖望相信关于长江的记载一定还有第四卷已经佚失,而那佚失的一卷里一定有很多细节可以弥补这种草率简略,但这毕竟只是推测而已。^⑦

不仅如此,而且在关于长江中下游的那六页中还存在着许多谬误。酈道元指出了《水经》原文的两处纰缪,但他自己也犯下了错误。^⑧对此他颇有自觉,在卷末如是感叹:

但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梁,世家分伙,故川旧渎,难以取悉,虽粗依县地,緼综所缠,亦未必一得其实也。^⑨

与此处的犹豫相比,酈道元常常以高度权威性的语气讨论北方地域,而且批评南朝人对北方的记录时相当严厉,这种严厉在他与早期地理著作产生分歧时是非常少见的。例如在颖水的章节里,对《水经》“又南过女阳县北”的经文,酈给出如下注疏:

县故城南有汝水支流,故县得厥称矣。阚驷曰:本汝水别流,其后枯竭,号曰死汝水,故其字无水。余按汝、女乃方俗之音,故字随读改,未必一如阚氏之说,以穷通损字也。^⑩

① 《水经注校释》,卷16,第304页。

② 《水经注校释》,卷35,第609、618页。

③ 关于全祖望的推测以及经注辑佚,见《水经注校释》,卷35,第612—616页。

④ 《水经注》缺失五卷的说法据说出于《崇文总目》,但《崇文总目》本身已不完整,该说法仅见于蔡珪《补正水经》(又称《补亡水经》)的欧阳玄(1283—1357)序。详见郑德坤编:《〈水经注〉研究史料初编》,第7、21页。

⑤ 《水经注疏》,卷28,第2418页;《水经注校释》,卷28,第508页。

⑥ 《水经注疏》,卷29,第2423页;《水经注校释》,卷29,第511页。

⑦ 陈桥驿不仅强调将长江注与沔水注一起阅读的重要性,而且甚至认为全祖望推测已佚失的章节实际上就是卷二十九。详见陈桥驿:《〈水经·江水注〉研究》,《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第112页。

⑧ 这一点由黄宗羲(1610—1695)指出,见《水经注校释》,卷29,第524页。关于酈道元对《水经》谬误的指摘,见《水经注疏》,卷29,第2431页;《水经注校释》,卷29,第512页。

⑨ 《水经注疏》,卷29,第2458页;《水经注校释》,卷29,第516页。

⑩ 《水经注疏》,卷22,第1818页;《水经注校释》,卷22,第388页。

酈道元在这里的语气是中性的，甚至是委婉的，以“未必”一词表达他的不同意见。这和他对五世纪初南朝作家刘澄之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澄之云：新安有涧水，源出县北，又有渊水，未知其源。余考诸地记，并无渊水，但渊、涧字相似，时有字错为渊也。故阡驸《地理志》曰《禹贡》之渊水。是以知传写书误，字缪舛真，澄之不思所致耳。既无斯水，何源之可求乎？^①

稍后，酈道元再次引用刘澄之，对他和另一位南朝作者郭缘生做出严厉批评：

刘澄之又云出檀山。檀山在宜阳县西，在谷水南，无南入之理。考寻兹说，当承缘生《述征》谬志耳。缘生从戎行旅，征途讯访，既非旧土，故无所究。今川澜北注，澄映泥汙，何得言枯涸也？皆为疏僻矣。^②

郭缘生曾于416—417年跟随宋武帝刘裕（420—422在位）北征，与另一位随员戴延之一样写下《述征记》，他们二人的文字都被《水经注》频繁引用，但也都受到酈道元的激烈指责，譬如称郭缘生“学而不思”，又直言戴延之“不通情理”。^③上面所引的两段话都以反问句传达出一种强烈的口气，在酈道元纠正早期地理著作中的错误时很少表现出来。

指责南朝作家对北方认识肤浅，让人想到与酈道元同时而稍晚的北魏作者杨衒之。杨衒之在其《洛阳伽蓝记》中写道：

谷水周围绕城，至建春门外，东入阳渠石桥。桥有四石柱，在道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颓桥，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衒之案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此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④

在这段文字中，就和在酈注里一样，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北魏的自豪感。只不过酈道元很少承认自己对南方地理也同样“多非亲览，闻诸道路”。在偶尔承认自己的局限时，他方便地将之归咎于“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故川旧渎，难以取悉”。

六 一位北魏朝臣对“世界”的构想

上一节的讨论，显示了《水经注》是一部深受作者北魏身份影响的著作。酈道元在一位雄心勃勃、渴望复成汉业、并将自己的王朝视为承继了晋朝旧统的皇帝治下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从南北竞争的角度来看，酈道元的注疏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以河流为纽带，将与实际地理空间相隔甚远的地域连接在一起。通过一种笔者称之为“关联式缝合”（associative stitching）的方式，酈道元以评注为枢纽，将视域从华夏中原地区延展至朝鲜、印度甚至罗马帝国，以及越南中部的占城王国。^⑤从注疏的宏观结构上看，酈注形成了一个文本网络，使已知世界的一大部分都相互连接在一起。

印度并未出现于《水经》经文，却出现在酈注中，这值得我们的特别关注。它说明酈道元一方面遵循《水经》设定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有所超越，以关联式缝合的手段推进了他自己的议程。笔者将

① 《水经注疏》，卷16，第1371页；《水经注校释》，卷16，第287页。

② 《水经注疏》，卷16，第1373页；《水经注校释》，卷16，第287页。

③ 《水经注疏》，卷19，第3419、2130页；《水经注校释》，卷19，第337、450页。

④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3页。

⑤ 见《水经注》卷一、十四、三十六。

在本节论述,这是酈道元将一个外来体系——佛教宇宙观的体系——纳入帝国想象的最明确的尝试。^①

我们需要回到《水经》,并再次提醒自己酈道元是在对一个现有文本进行注疏。换句话说,虽然他在扩展原始文本方面有极大的自由度,但是,他无法选择或改变原始文本在何处或者如何开篇。《水经》的开篇是黄河的起源:

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屈从其东南流,入于渤海。^②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南流。^③

酈道元对这段区区59字的短文所作的注疏构成了《水经注》第一卷的全部。在这一卷中,酈道元做了数件值得注意的事:(1)他先是在黄河与印度之间建立起文本关联,但又随即指出这种关联充满了问题;(2)通过罗列多种关于昆仑山的名称与位置的理论,他质疑了经文对昆仑位于“地之中”的说法;(3)虽然酈道元广泛征引佛教记载、将印度佛国——带入注疏,但是,他却又通过一个巧妙的修辞方策,削弱了在那些记载中佛国所享有的主导地位。

正如我们在上面引文中看到的,《水经》称昆仑山距洛阳附近的嵩山有五万里之遥。嵩山也被称为中岳,因为洛阳在由来已久的华夏本土传统中被视为世界的中心。^④对此酈道元广征博引,给出了一系列关于昆仑与嵩山/洛阳之间距离的不同理论,在这些理论中该距离时短时长。酈道元随后写道:

数说不同。道阻且长,经记繇褻,水陆路殊,径复不同,浅见末闻,非所详究,不能不聊述闻见,以志差违也。^⑤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注疏家,酈道元并未毫无保留地同意原始经文的观点。相反,他提供各种说法,并把读者注意引向这些说法之间的“不同”。这一做法事实上在含蓄地鼓励读者对昆仑山乃“地之中也”的断言进行再思考。酈道元也坦率地承认自己无法作出仲裁,而这也正凸显了他的客观性和中立态度。在接下来的注疏中,他一再重申他的客观立场,并且不断提醒和告诫读者。因此,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分析酈道元引文的内容,并在引用资料的原文仍然有据可查时,关注他引用原文的方式,也考察他自己对这些引文的评估。

在卷一最长的一段注疏中,酈道元引用释道安(312—385)《西域志》中将昆仑山与阿耨达山视为一山的说法^⑥,并继续以道安为依据,指出印度河与恒河是六条从昆仑山发源的大河之一。就这样,在黄河与印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联。^⑦随后,酈道元汇总多种资料,包括释法显(约340—421)的《佛国记》,编写出一段关于印度佛国的长篇叙事。但是,在广泛引用这些资料之后,酈道元叙述了道

① D. Jonathan Felt 认为酈道元在有意建构一个“印华二元世界观”,将印度和华夏视为对等的一对,以纠正华夏中心主义,这是他书中第五章的主要论点(Felt, *Structures*, pp. 211-255)。该论点将酈道元呈现为一个更符合今天观念的作者,但证据支离,对《水经注》文本存在很多误读。笔者倾向于认同徐约和的观点,即酈道元试图将新的历史知识融入一个早期文本的现存框架中,尽管笔者并不认为酈道元此举是为了追求“全面性”。另可参阅 Alexis Lycas, “Le décentrement du regard géographique dans le *Shuijing zhu* de Li Daoyuan (527)”, *BEFEO* 104, 2018, pp. 241-266。

② 此处渤海指位于新疆东南部的蒲昌海(罗布泊),今已干涸。

③ 《水经注疏》,卷1,第1—66页。《水经注校释》从戴震删“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见《水经注校释》,卷1,第11页。

④ 见王邦维:《“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94—100页。

⑤ 《水经注疏》,卷1,第5页;《水经注校释》,卷1,第2页。

⑥ 《水经注疏》,卷1,第13页。陈桥驿从戴震题为《西域记》,见《水经注校释》,卷1,第3页。二者指同一部作品。

⑦ “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水经注校释》,卷1,第3页)后来酈道元又引用三世纪康泰《扶南传》,其中视昆仑山为恒河之源(见《水经注校释》,卷1,第4页)。如熊会贞所言,酈道元“盖隐隐以新头河、恒水为六水之二水”(见《水经注疏》,卷1,第15页)。

安如何引用《穆天子传》、浮图调(按即竺佛调)以及康泰的著作,力图说服其同时代僧人竺法汰(320—387)昆仑山就是阿耨达山。^①在这个关口,酈道元加入了下面的按语:

余考释氏【按即释道安】之言,未为佳证。穆天子、竹书及山海经,皆埋疉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至欲访地脉川,不与经符,验程准途,故自无会。释氏不复根其众归之鸿致,陈其细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②

很明显,酈道元并不认同释道安将昆仑山与阿耨达山等同起来的观点。酈道元在注疏中加入关于印度佛国的长篇大论,其唯一理由就是印度的大河就像黄河一样也发源自昆仑山,因为昆仑山“就是”阿耨达山;而在此长篇注疏之后,却反驳了释道安“昆仑山乃阿耨达山”的说法,这不啻是一个反高潮!但是这样的反高潮作为注疏的一种写作模式却很可以理解,也就是说,注疏者先是尽其可能地、不加褒贬地提供有关一个话题的所有信息,然后,再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判断。^③

酈道元随即引用《山海经》与郭璞注以及《淮南子》一书,指出即使《淮南子》“仿佛近浮图调之说”,关于“阿耨达六水,葱岭、于阗二水之限”的说法也还是“与经史诸书全相乖异”。^④他接着引用东方朔《十洲记》,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昆仑山等于阿耨达山的怀疑,并进一步质询那些关于昆仑山的互相矛盾的记载:

考东方朔之言及经五万里之文,难言浮图调、康泰之是矣。六合之内,水泽之藏,大非为巨,小非为细,存非为有,隐非为无,其所苞者广矣。于中同名异域,称谓相乱,亦不为寡。至如东海方丈,亦有昆仑之称;西洲铜柱,又有九府之治。^⑤

酈道元接下来引用了一系列道教作品,包括《神异经》《遁甲开山图》,以支持他关于昆仑、铜柱的上述说法。^⑥在卷一末尾,他得出了昆仑山的真实位置不可确知的结论:

然六合之内,其苞远矣。幽致冲妙,难本以情,万像遐渊,思绝根寻。自不登两龙于云轍,骋八骏于龟途,等轩辕之访百灵,方大禹之集会稽,儒墨之说,孰使辨哉?^⑦

“六合之内,其苞远矣”与前文“六合之内……其所苞者广矣”呼应,而这一悲观的结论也回应了酈道元在卷一开头所表明的立场,也就是说,他只能为读者呈献相互矛盾的说法,而无法对它们做出评判和仲裁。如是,卷一注疏首尾相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综上所述,酈道元虽然记录了有关昆仑山为印度大河发源地的说法,但却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他提倡一种谨慎的、抱有怀疑精神的态度来对待引用的材料,旨在召引而非裁断,激发而非解决。人们可能会问,若果真如此,那么酈氏为何还要在其注疏中包含一段关于印度佛国的长篇叙述呢?笔者认为,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酈道元希望做一个负责的注疏家,向读者呈献一切现有的信息资料和观点,以便在现存的经文框架中“纳入新知识”(徐约和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也的确存在着大量可利用的现有资料。^⑧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酈道元为其已知世界中的河流构建了一个四通八达、互相关联的文本网络,以求纳入佛教的世界叙述——考虑到酈道元时代北魏君王、贵族、朝臣对佛教的狂热

① 《水经注疏》,卷1,第57—58页;《水经注校释》,卷1,第9页。

② 《水经注疏》,卷1,第59页;《水经注校释》,卷1,第9—10页。

③ 与此类似,裴松之也会在《三国志》注中引用历史材料再对之进行驳斥。如《三国志》5(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61页)。

④ 《水经注疏》,卷1,第60—61页;《水经注校释》,卷1,第10页。

⑤ 《水经注疏》,卷1,第64页;《水经注校释》,卷1,第11页。

⑥ 酈道元引用了张华(232—300)的《神异经》“叙”,这说明他参考的是附有张华注的《神异经》版本。

⑦ 《水经注疏》,卷1,第66页;《水经注校释》,卷1,第11页。

⑧ 譬如说公元四、五世纪有众多佛教著作可供酈道元参考,包括游方僧人关于印度的目击游记。

信仰,此类叙述很难忽略,也无从驳斥——但同时又在含蓄地提醒他的预设读者这些叙述的潜在谬误。事实上,如果酈道元并不像诸多皇室成员以及他的朝廷同僚那样对佛教充满狂热信仰^①,那么与其回避那些佛教的地理叙述,倒不如直面它们——因为在当时它们反正是众所周知的——并将相互矛盾的说法一起呈现给读者以展示它们的互相抵牾,这或许才是最有效的。

在此,有必要再次强调前文提到的一点:在注疏中引用某一材料并不一定表明注疏者认同该材料,这就像酈道元引用南朝作者的“谬误”记载只是为了对其展开批评、显示一己学识一样。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酈氏通过对早期中古佛教作者将中天竺称作“中国”说法做出别出心裁的解释,来削弱佛国的中心地位^②:

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为中国,人民殷富。中国者,服食与中国同,故名之谓中国也。^③

此处酈道元引用了法显《佛国记》,但无论是无心还是有意,他的引文背离了原文,这一背离所表达出的观点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但它对理解酈道元的世界想象至关重要。正如杨守敬所指出的,法显原文是说印度北部的乌长国(Uḍḍiyāna)和印度中部(中天竺)也即法显所说的“中国”有相同的衣服饮食^④,其原文如下:“乌长国是正北天竺也,尽作中天竺语,中天竺所谓中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⑤

酈道元却说:“中国【天竺】者,服食与中国【华夏】同,故名之谓中国。”他的第二个“中国”显然有别于第一个“中国”,而第二个“中国”才是用来衡量和比较第一个“中国”的标准和规范。换言之,在酈道元看来,天竺“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并非如佛教徒所言是因为释迦牟尼在此成佛^⑥,也不是因为它作为佛教圣地而具有精神或道德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它在社会与世俗生活中一些最平凡的方面——衣服、饮食——“与中国【华夏】同”^⑦!

带着这一观察,笔者将回到酈道元《水经注》意识形态倾向这一议题。《水经注》以一位北魏朝臣的愿景和遐想为基础,这位朝臣深谙北魏国家机器的运作,同时,也是一个渴望在文化领域留下自己痕迹的学究型注疏家。他的评注毫不含糊地凸显了北魏王朝的政治中心平城与洛阳,使流经这两座都城的小河流都不成比例地获得了显著地位,也远比在《水经》原文中显得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整部《水经注》的第一卷中就包含对佛国的论述其实是一个熟悉的手势:像《水经注》这样的“地理”著作在前现代一直都被视为“史”的分支,而在这样的著作中纳入对印度佛国甚至罗马帝国的叙述完全符合从《史记》以来国史编写的惯例,也就是说,将边疆、异域尤其是周边邻国的记述包括在内。

① 关于酈道元对佛教的态度,我们没有任何资料;但总体来说,《水经注》除卷一之外对佛教事迹的关注极为有限,表现出对佛教兴趣的缺乏。笔者将在下文回到这一点上。

② “把中天竺视为中土、中国视为边地的看法在法显的时代并不具有普遍性,事实上还曾引起过相当激烈的辩论和争执。”有关讨论见笔者 *Visionary Journeys*, pp. 97-98(中文版《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第101页)。

③ 《水经注疏》,卷1,第20页;《水经注校释》,卷1,第4页。

④ 《水经注疏》,卷1,第20页。

⑤ 足利喜六注:《法显传考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9页。

⑥ “佛经有时把这种观点颠倒过来,不是说佛祖诞生地构成了世界中心,而是称佛祖只能诞生在世界中心,否则他的圣身就会颠覆大地的平衡。”Tian, *Visionary Journeys*, p. 97(中文版《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第99—100页)。

⑦ 我们应注意,此处对“中国”一词的理解与酈道元在卷一其他地方对此词的使用一致。在卷一开始时,酈道元引用应劭《风俗通义》解释“四渎”的“渎”字:“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水经注疏》,卷1,第8页;《水经注校释》,卷1,第2页)在卷一结尾处,酈道元称黄河“径积石而为中国河”。这两处“中国”都指华夏中心,和佛教徒心目中的“中国”毫无关系。

事实上这也正是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所采用的结构和修辞手段。这部作品分五卷，依次记述洛阳中心或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的佛寺及其附近的地标。然而，与其他部分不同的是，最后一卷主要记叙了宋云和僧人惠生受胡太后委派前往西域求经之旅，宋云家住洛阳城北，这是他们的旅程与洛阳城北的唯一关联。惠生与宋云于518年离开洛阳，521年返回。杨衒之详细叙述了他们访问的国家，最后以交代游记文本来源结尾。^①《洛阳伽蓝记》整体框架结构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刻意而为的修辞策略：它将封闭自足的洛阳城打开，与遥远异地连接起来。这种修辞策略的目的和效果，是通过“他者”的视角来反观北魏：用乌长国君主充满敬意的话来说，北魏才是“佛国”，乌长国君主甚至表示希望来世能够生在北魏。^②有趣的是，法显的旅伴道整也曾发下类似的誓愿，只不过方向恰好相反，在中天竺停留不返，“愿不生边地”。^③杨衒之巧妙地将北魏都城变成了佛教中心，而他采取的方式正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外在于北魏洛阳的“他者”视角。

我们还可以举同期南朝史家为例。如前所述，郦道元对《宋书》颇为熟悉，而在《宋书》里，沈约也同样将远方异地纳入国史记述，通过他者视角展现我者。沈约在“夷蛮传”中收录了一系列南亚、东南亚君主寄送刘宋皇帝的书表，它们无一例外把建康描绘成一个灿烂辉煌的佛教乐土，如“忉利天宫”，如“须弥山”，云云。^④值得注意的是，沈约恰恰把对于佛教的长篇介绍放在“夷蛮传”里，这既是方便之计，也构成一种隔离对待（segregation）。称其为方便之计，是因为那些佛国君主的书表充斥着佛教话语，因此在引述它们之后可以方便地转入对佛教的介绍；称其为隔离对待，则是因为夷族乃是种族上的他者，在地理上也远离刘宋领土，如此一来，沈约把佛教放置于“夷蛮传”的叙事语境就变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在刘宋王朝与外来宗教之间创造出物理上的距离。

和沈约一样，郦道元将北魏的政治中心与远方佛国联系起来，归根结底只不过创造出了一种隔离对待，其具体手段是把关于佛教胜地与事件的最详尽的讨论基本上局限在一卷之中。虽然说他的注疏中的确提到一些佛教寺庙，但是这类指称稀少而零散，与佛教场所的实际数量完全不成比例。比如在卷十六对洛阳的叙述中，他只提到了三所佛寺，然而据元澄（467—520）在518年上疏所言，当时洛阳佛寺超过500座^⑤；杨衒之也提到，在北魏统治于534年分崩瓦解之前，洛阳共有1367座寺庙。^⑥就关于佛教的描述而言，《水经注》卷一和其他卷帙之间的反差尤其鲜明。

作为注疏者，郦道元不得不遵循《水经》经文已经设定的结构，他无法摆脱黄河及其所谓的发源地而从其他河流开始他的注疏。同时，他也很想在源远流长的注疏传统中做一个负责任的注疏家，为读者尽可能详尽地提供既有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他所占据的位置令人想到刘勰，不断地在他的书写媒介中——宇文所安所谓的“话语机器”也就是骈文文体——挣扎。^⑦但是比起刘勰来，郦道元对于他的评注有更多的控制，因为郦毕竟可以在他刻意引用的材料之外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一干文献材料的众声喧哗之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总而言之，郦道元注疏中的笔墨之河构成了一个蓝色公路的文本系统，将帝国中或远或近的地

① 来源为《惠生行记》《道荣传》《宋云家纪》（见《洛阳伽蓝记》，卷5，第342页）。

② 《洛阳伽蓝记》，卷5，第298页。

③ 足利喜六注：《法显传考证》，第246页。

④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97，第2381页。

⑤ 《魏书》，卷114，第3045页。

⑥ 《洛阳伽蓝记》，卷5，第342页。

⑦ 宇文所安：《刘勰与话语机器》，《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点和城市以及周遭邻国都连接在一起。具有讽刺性的是,一部像法显《佛国记》那样的游记尽管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人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向,但这类游记却随即被挪用并纳入了像《水经注》这样对帝国的新构想中。

结 语

本文从对《水经注》的“文学式”阅读开始,考察了酈道元的语言和修辞,并考量他所选择的注疏体裁之传统和语境,在这些观察之上提出《水经注》采取了征赋的写作模式,而这一写作模式与当时南方的山水诗模式恰好相悖:征赋以人类事件为中心,密切关注那些作为历史、文化和社会交汇处的地点;南方山水诗却侧重于山水的美学和精神性的吸引力,对一个场所的地方身份特征不甚关怀,提供了一个逃脱帝国和历史的途径。这就好像在观看传统山水画时,人们往往并不询问此山此水属于何时何地,而是在对无名山水的凝视与欣赏中,暂时忘记家庭纽带、社会关系、历史的负担、帝国的关怀。

酈道元则正好相反:他深深地嵌在帝国秩序里,他的关注带有浓厚的北魏色彩。酈道元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植根于北魏的现实。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但并不妨碍南北政权都以汉晋统一帝国的视角来构想“天下”。当北魏孝文帝迁都到曾经是东周、东汉和西晋首都的洛阳,他也就将那些王朝的过去纳入了北魏的叙事之中。在以水为德的北魏帝国话语建构中,有什么是比河流更合适的呢?在一个幅员辽阔、族群众多的帝国中,河流构成了连接各个分离单元的基础设施,它们是政体的血脉。

公元527年,在齐灭后投奔北魏的齐明帝之子萧宝夤(485—530)发动叛乱,酈道元及随从士卒被叛军围困在山顶驿亭,只有山脚下才有井水,他们试图向下挖水,但挖了很深后仍然无法到达水源,“水尽力屈”,叛军越墙而入,酈道元遂被害。^①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位洋洋洒洒为河流作注的注疏家终因缺水而命丧黄泉。

酈道元死后不到一年,北魏陷入内战,最终导致534年的崩溃瓦解。名都洛阳遭到毁灭和遗弃,再次沦为一片废墟。但是,酈道元为小小谷水所作的注疏却幸存下来,在其中,洛阳城作为历史和文化的一个中心交汇点熠熠生辉,一系列著名的历史人物如照亮夜空的繁星一般点缀在书页之间,它是北魏王朝跳动的心脏,梦想着那个注定无法实现的大一统帝国的辉煌。

(责任编辑 周 萍)

^① 《北史》,卷27,第996页。